

黔中城市史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

范松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k297.3
128

黔中城市史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

范松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中城市史.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 / 范松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21-12688-7

I. ①黔… II. ①范… III. ①自然资源-资源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贵州省②城市群-城市建设-研究-贵州省 IV. ①K297.3②F127.73③F299.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5271 号

黔中城市史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

范松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龙建人 徐 一

封面设计 熊 锋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2688-7 定 价: 42.00 元

本书获2015年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黔中城市史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

范松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城市改革开放的探索	18
第一节 城市建设理论的拨乱反正	19
一、城市建设拨乱反正的准备	20
二、城市建设理论拨乱反正的推进	25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黔中城市	27
一、贵阳城市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27
二、贵阳城市面貌的初步改变	30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安顺城市	34
四、遵义城市的改革新貌	37
五、改革开放初期的黔中其他城镇	39
第二章 黔中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44
第一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45
一、贵阳市增强企业活力的探索	45

二、安顺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成就	50
三、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充满活力的遵义	54
四、黔中其他城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举措	56
第二节 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59
一、贵阳—安顺城市工业的发展	60
二、遵义、都匀、凯里工业的变化	64
三、第三产业的恢复性增长	68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城市功能的加强	75
一、贵阳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城市功能的转型	76
二、安顺、遵义等黔中城市的市场经济建设	84
第三章 西部大开发与黔中城市发展体系模式的转化	91
第一节 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92
一、“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大讨论	93
二、贵州省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95
三、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成就	100
第二节 黔中城市发展体系模式的转化	103
一、黔中龙头城市贵阳发展体系模式的创新	104
二、西部大开发中安顺的城市发展模式演变	109
三、遵义城市发展模式的突破性转型	114
四、都匀、凯里城市发展模式的新思路	117
第三节 新区建设与黔中城市现代化的加速	126
一、西部山地省会城市城镇化的示范——金阳新区	127
二、安顺市城市新区的崛起	133

三、汇川区建设与遵义市中心城区的拓展	138
四、动态变化中的都匀城市新区建设	142
五、凯里：从边缘到中心的城市思路发展	146
第四章 从黔中经济区到黔中城市群	151
第一节 黔中城市的“工业强市”战略	153
一、贵阳市的工业强市战略与实施	154
二、安顺市在工业强省中的举措	159
三、“提速赶超、转型跨越”的遵义“工业强市”战略	163
四、都匀市的“盘活存量和引进增量并举”战略	167
五、“优化工业布局，发展园区经济”的凯里战略	171
第二节 黔中城市辐射力的增强与城乡统筹发展	174
一、贵阳市城市辐射力的跨越式飞跃	175
二、黔中其他城市辐射力的增强	181
第三节 黔中城市群雏形的显现	191
一、黔中经济区的提出与规划	192
二、贵阳—安顺核心带的打造	197
三、黔中城市群与黔中经济区的同步推进	202
第五章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典范城市群	209
第一节 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10
一、黔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现状	211
二、黔中城市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216
三、贵阳—安顺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218

四、遵义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效	224
五、都匀、凯里的产业结构调整	227
第二节 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	231
一、黔中地区创建生态文明城市的客观环境	233
二、贵阳市创建生态文明城市的殊荣	236
三、黔中其他城市的生态文明城市创建	240
第三节 打造生态循环经济典范城市群	248
一、“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诞生	248
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循环经济	252
三、黔中生态循环经济城市群崭露头角	261
主要参考书目与文献	266
后 记	275

导 论

《黔中城市史——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群的征程》是《黔中城市史》的第三部。这部书的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发展理论的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黔中城市功能的变化、西部大开发对黔中城市发展的强力推进、“工业强省”战略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黔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生态循环经济城市群创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等。上述黔中城市的发展历程,许多读者都曾亲历、亲见,甚至亲身参与过,因而,这部书的撰写无论在史料的择取、事物发展的阐述及理论的分析方面,都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2008年着手撰写第一部《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到现在,已经过去7个年头。这期间,世界各国经历着现代化的不同考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城市化的理论、城市发展的道路、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趋同与差异,有了十分深刻的探讨;而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已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地处中国西南山地高原、有着锥状喀斯特复杂地貌、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黔中城市,进行发展历程的当代考察,变得更加不易。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全会除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外,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城市化才得到迅速发展。有学者指出:截至 2009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仅达 46%,距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但如果按照当前的水平发展下去,到 2030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可能超过 60%。这意味着在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将有约 4 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导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①

与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过渡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在中共中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便已提上了议事日程。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 年又一次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但因其间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整顿、“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等曲折,因此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城镇化,主要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进的。一些学者在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曾指出:“一方面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新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期间还与苏联关系紧张。”^②因此,那一阶段城镇化的主导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冷战思维所左右。

从国家整体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农村改革逐步推进,各省区的城市改

① 孙中和:《中国城市化基本内涵与动力机制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1 年第 11 期。

② 叶剑平、张有会:《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进程》,求是理论网,2010 年 3 月 25 日。

革也开始起步。从1978年开始到2014年的36年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以农村改革为动力,通过农村经济繁荣,由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发展。这一阶段大体在1978年至1984年。由于当时农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开始探索,因而,城镇的发展重点侧重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与完善经济责任制、实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以及综合部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城市自身的建设大多局限于恢复基础设施与确保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层面,大部分城镇尚未来得及将城镇规划与发展列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城镇化的进度相对较为迟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国家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从这时起到1991年,以城市为重点、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明星城市,并通过这些城市带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特区与开发城市的不断增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进而推动了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1992年后的十年,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轨、房地产与土地制度的有机结合,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全国普遍设立了开发区和国家对土地市场进行了深化改革,加上国家推行城镇住房与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各地城镇得到快速发展。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也导致了经济波动加剧、城乡差距显著扩大,出现了工业产品结构性过剩,乡镇企业和大量城市工业效益滑坡,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显著下降;农民的流动范围由最初的本县和邻县,逐步跨出省界,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大规模转移。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国家实施新的城镇化战略,以城镇化拉动内需,但“在居民有效收入没有

提高的情形下,赋予城镇化以‘不能承受之重’”^①。

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发生战略重大转折。中央一方面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政策;针对区域差距过大的不利局面,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继“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分别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力求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城镇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公共交通、节能环保型住宅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传统和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打造宜居城市等方面工作,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获得了较大的进步。

从2008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体制改革要点,城镇化成为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也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发展难题的一条出路。二十余年中的“小城镇,大战略”最终被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显现的由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与此同时,关于人的城镇化、户籍改革、城镇化中的产业支撑、土地问题等也相应地提上了新型城镇化的议事日程。

二

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探讨,离不开城市发展史的研究。

今天我们对当代城镇问题的研究,只有在对具体城镇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才能找到事物发展的脉络;在基于对

^① 陈锋:《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和展望》,《规划师》,2009年第1期。

东、中、西部城镇发展具体案例考察,并从个例到群体展开研究的前提下,才能寻觅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是以国家发展战略、制度体制和政策为背景的。换言之,无论是国家层面指导下的城镇化,还是地区与省区的城镇化,都不可能脱离国家特定的体制、机制背景和环境独立展开。城镇化本身不会孤立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起核心作用,它只有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才能获得发展动力。要确保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既不能过度偏向于政策的影响,坐等国家给予的发展优惠,也不应完全由市场自发机制起决定作用,更不能让国家公共服务和经济调控职能缺失,否则将导致城镇化进程出现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镇化的发展,正是伴随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分阶段展开的。这一城镇化进程,事实上即是省境内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演变过程。透过对全省城镇化水平高低的考察,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贵州 17 万平方公里山地高原在 30 余年中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与社会组织和管理水平的进步程度。

如果对 1978 年以来的贵州城镇化进行阶段性分析,不难看出:从早期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当前实施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战略,是一个城镇化不断加速,城镇化发展理念与改革开放深化紧密结合,迈上创新之路的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0 年的一段时间,贵州省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贯彻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根据省情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初步调整。其中包括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与调整投资结构;以发展日用消费品为中心进行工业调整;因地制宜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全面整顿国营企业等。

1981年国家开始实施“六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是首次将“社会发展”列入名称的五年计划,从宏观上体现了改革与探索发展经济新路子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指导还未得到纠正和解决,拨乱反正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要立足于全省各级、各部门在进行调整的同时,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步把对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到重要位置。因此,贵州省“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主要是“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特别要在抓紧进行调整、整顿的同时,按照中央部署加快改革的步伐,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力争国民经济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持续、稳定增长,使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同时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和必要的准备工作,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准备条件”^①。

鉴于“六五”时期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任务,这一阶段的贵州城镇建设,事实上并未纳入政府的工作视野。包括全省国民生产总值12.3%的年增长率、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提高、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取得的成绩、国内外贸易的增长、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的建设成就,都仅仅是给未来城镇建设奠定了基础。直到1984年,小城镇发展问题才第一次受到中央政策的肯定与支持。同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和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下发以后,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战略才逐渐提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议程。

贵州城镇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始于1985年。从那时起到1991年,在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过程中,城市改革产生的“拉力”,成为贵州城镇建设的主要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渐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① 《当代贵州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第2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通过对国有企业全面推行“拨改贷”，深化企业“承包制”，实施“利改税”，推动了以轻工业为代表的城市工业的全面发展；加上城市工业的恢复性增长，以省会贵阳为代表，各地、州、市治所在地及县城的建设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据有关资料介绍：“1984年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确立城市发展区和农民买户口进城等城镇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据统计，在1979—1992年的13年间，贵州建制城市数量由5个增加到10个；城镇人口由1979年的378.07万，增加到1992年的666.79万，净增288.72万；城镇人口比重由1979年的13.8%提高到1992年的19.8%。13年间，城镇化水平提高了6个百分点。”^①

1991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贵州省的城镇化主要是在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轨的驱动下，以房地产与土地制度有机结合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力来进行的。1992年，在总结“七五”期间城市建设成绩与经验的基础上，贵州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城市建设的决定》。随着国家对土地市场进行深化改革，以及接着推行的城镇住房改革，促进了全省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1995年起，省内20个市县陆续启动了旧城改造。通过旧城改造，全省城镇体系趋于合理，城市建筑、道路、公共设施均有了明显进步，城市化水平相应提高。到2000年世纪之交时，根据省人民政府1999年9月作出的《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全省明确了城镇化的近期目标。具体为，到2002年规划建设好万人以上规模的小城镇100个，其中有较强综合实力和示范作用的明星城镇10个。同时建制市的综合实力要明显增强，城镇面貌要有明显改观，全省城镇化水平要达到20%以上。尽管这一目标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但在长期依赖农村集市贸易保证城镇供给的贵州，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飞跃。

^① 龚晓宽主编：《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六十年研究》，第7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2000年3月正式开始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成为贵州城镇化的巨大推动力量。作为国家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的一项总战略,这场大开发,为贵州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城镇化既是西部大开发总战略、总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和突破口。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城市化,只有城镇建设发展,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才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才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贵州不仅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工业结构调整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城镇化也驶上了快车道。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07年,全省城镇人口达到了1122.68万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达到28.2%。^①

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到第二个10年初,世界经历着由冷战时代到一家独大再到世界多极化的巨变,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在认真思考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有学者甚至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断言:“21世纪已经可以肯定是人类社会在总体上完成城市化转型的世纪。”^②这一判断是有相当依据的。据2001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表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简要报告》,20世纪初,全球16亿人中城市人口只占14%,1900年以后的一百年,即到2000年,全球人口增长了约4倍,城市人口则增长了约13倍。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城市化率提升到了47%。就中国内地的情况来看,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城镇人口为458538213人,占城乡总人口的36.22%。仅仅过了1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达到665575306人,占城乡总人口的49.68%。同一时

① 贵州省统计局:《贵州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②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前言,东方出版社,2013年。